

漢語史研究中心簡報

*The Briefing News of
Research Center for History of Chinese Language*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

- ❖ 汉语外来词杂谈（补订稿） 张永言（1）
- ❖ 理论与事实：语言接触视角下的中古译经语法研究 遇笑容（21）
- ❖ 荷兰莱顿大学 George van Driem 教授来我中心作学术报告（31）
- ❖ 丁邦新教授来我中心讲学（33）
- ❖ 北京大学中文系陆俭明教授来我中心与研究生座谈（36）

2007 年第 3-4 期（总第 27-28 期）

2007 年 12 月

论文选刊

- 汉语外来词杂谈(补订稿)张永言(1)
- 理论与事实:语言接触视角下的中古译经语法研究.....遇笑容(21)

基地建设

- 中心召开学期末工作例会..... (30)

学术交流

- 荷兰莱顿大学 George van Driem 教授来我中心作学术报告..... (31)
- 丁邦新教授来我中心讲学..... (33)
- 第五届丁邦新语言学奖颁奖仪式暨丁邦新学术演讲会在邵科馆举行..... (34)
- 颜洽茂教授被评为全国语言文字工作先进工作者..... (34)
- 丁邦新教授在我校“东方论坛”作学术讲座..... (35)
- 丁邦新先生来我中心作学术讲座..... (35)
- 中国人民大学胡明扬教授将来我中心作学术座谈..... (36)

-
- 北京大学中文系陆俭明教授来我中心与研究生座谈…………… (36)

研究生动态

- 第五届（2006 年度）丁邦新语言学奖评选揭晓 …………… (38)

论文选刊

漢語外來詞雜談¹（補訂稿）

張永言*

[內容提要] 本文概述漢語外來詞的各個方面，對不同歷史時期和不同類型的外來詞有所論列，重點是舉例討論見於各類作品的語源不一需要考定的外來名物詞，此外還涉及流俗詞源和貸詞回歸的問題。

[關鍵詞] 外來詞 文化詞 詞源學 流俗詞源 漢語詞彙史

0. 1 古代和近代漢語都包含相當數量的外來詞彙成分²，見於各類典籍，情況十分複雜，需要分別處理。比方說，有的外來成分已經進入漢語詞彙系統，並不同程度地穩固下來，理應算作漢語裏的外來詞，而有的只見於個別特定場合，未必能算作漢語裏的外來詞；就各類外來詞而言，有的已經研究得比較充分，而有的至今還缺乏全面的搜集和深入的探討，有待於各相關學科的學者們多多致力。在這篇小文裏筆者打算就諸如此類的問題略舉例證，作一個初步的粗淺的說明。

1. 1 古代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與周邊各地區民族也多有接觸，在遠古和上古時期民族、語言和文化交流融合的情況異常複雜³。以中原地區的華夏語為核心而逐

¹ 原載《語言教學與研究》1989年第2期（創刊10週年紀念號之二）。此文為應陳亞川教授（1938-1996）為刊物紀念號徵稿而作，匆匆急就，頗為疏略，今蒙方一新、王雲路、汪維輝三教授與真大成博士鼎力相助，得以補訂成篇，就正同好，謹志心感。

* 張永言，成都四川大學中文系教授。

² 參看徐文堪：《外來語古今談》，語文出版社，2005。

³ 參看 Terrien de Lacouperie: *The Languages of China before the Chinese: Researches on the*

步形成的漢語實際上是一個混合體⁴，其中容納了多種語言的成分。在先秦時期的上古漢語裏就可以考察出來從鄰近語言吸收的詞彙成分。例如：

貝 這是一個古老的詞，殷商卜辭裏已見。據江上波夫考證⁵，“貝”乃是隨同從華南輸入貝殼(用作裝飾品與貨幣)⁶而借自南亞語(Austroasiatic)或南島語(Austronesian)的一個詞。比較泰語 beer，占語(Cham)、吉蔑語(Khmer)bier，馬來語 bia，爪哇語 beya。

匹(鳴) 《廣雅·釋鳥》：“鳴、鶩，鬣(鴨)也。”“鳴”為後起加形旁字，古籍作“匹”⁷。《禮記·曲禮下》：“庶人之摯匹。”《周禮·春官·大宗伯》：“庶人執鶩。”可見匹就是鶩。《孟子·告子下》：“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為無力人矣。”匹雛就是鴨雛。據聞宥考證⁸，“匹”在漢語裏出現晚於“鶩”而早於“鳴”，是源於台語

Languages Spoken by the Pre-Chinese Races of China Proper Previously to the Chinese Occupation, London, 1887; 艾伯漢(Wolfram Eberhard): *Untersuhungen über den Aufbau der chinesischen Kultur*, 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3, 1942; 又: *The Local Cultures of South and East China*, Leiden: E. J. Brill, 1968; 又: “Review of *China’s March toward the Tropics* by Harold J. Wiens,” *Oriens*, Vol. 8, no. 2, 1955, p. 305; 蒲立本(Edwin G. Pulleyblank): “The Chinese and Their Neighbors in Prehistoric and Early Historic Times,” 吉德煒(David N. Keightley, e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pp. 411-66; 薛愛華(Edward H. Schafer): “The *Yeh Chung Chi* (鄴中記),” *T’oung Pao*, vol. 76, 1990, p. 150; 馬學良主編《漢藏語概論》上冊，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頁79—96; 余志鴻：“‘賓動’倒句和語言交融，”《民族語文》1988年第3期。

⁴ 王敬驪云：“中華民族本是多民族融合的人們共同體；”“所謂漢人，主要是由古代進入‘中國’爭雄問鼎的越人、夷人、羌人以及其它出入中原地區的人們共同體融合而成的；”“所謂漢語，應是我國古代的越語、夷語、羌語以及其它有關人們共同體所使用的語言融合而成的。”見“釋‘蘇’‘荏’——漢語詞考原之一，”《雲南民族語文》1993年第2期，頁1、5。

⁵ Egami Namio (江上波夫)：“Migration of Cowrie-shell Culture in East Asia,” *Acta Asiatica*, No. 26, 1974, p. 29. 參看蘇繼頤：《島夷志略校釋》，中華書局，1981，頁117。

⁶ 考古發現表明，殷商、西周時期的墓葬中隨葬的貝幣都是不產於中國內陸的江河湖泊而產於南海或印度洋的海貝。見羅二虎：“南方絲路古貝考，”伍加倫、江玉祥主編《古代西南絲綢之路研究》，四川大學出版社，1990，頁97—8。參看H. E. Gibson: “Cowries as Money during the Shang and Chou Periods,”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71, 1940/1941; 濱田耕作：“支那古代の貝貨に就いて，”《東洋學報》第2卷第2號，1912；又：“貝貨考補遺，”同上第3號，1912；楊鍊漢譯文“中國古代貝貨，”《古物研究》，商務印書館，1936，頁1—14；蔣玄怡：“中國古代貝貨之由來與吳越民族之關係，”《說文月刊》第1卷第4期，1939；鄭家相：“古代的貝貨，”《文物》1959年第3期；朱活：“關於我國古代貝幣的若干問題，”同上1959年第6期；李家瑞：“古代雲南用貝幣的大概情形，”《歷史研究》1956年第9期；方國瑜：“雲南用貝作貨幣的時代及貝的來源，”《雲南大學學報》1957年第2期。

⁷ 參看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履部“匹”字條。

⁸ 聞宥：“語源叢考·鴨鳴鶩三詞次第考，”《中華文史論叢》1980年第4輯，頁135-45。文中論《孟子》“匹”字，引孫奭《音義》：“匹，丁作疋。今按〈方言〉…”又引焦循《正義》之說，謂“其實孫、焦兩家都是迂儒之見。”筆者按：“今按〈方言〉…”為阮元《孟子注疏校勘記》之文，與孫奭無涉，“孫、焦”應作“阮、焦”。

或其他南亞語的一個詞。比較阿含語(Ahom)pit, 老撾語 pēt, 泰語 pēt, 傣語 pet, 壯語、布依語 pit, 侗語 pot, 黎語 bet, 佉語 pet, 德昂語(即崩龍語) peit/pjit/bit, 京語、越南語 vit。

像上述這一類出現在上古時期的外族語詞彙成分, 以代遠年湮, 文獻不足, 多半難於考實, 因此未必宜於看作漢語裏的外來詞。

2. 1 在中古和近代作品裏時或出現由於特定原因而使用外族語詞的情況。例如:

劉義慶《世說新語·政事》:“王丞相拜揚州, 賓客數百人, 並加霑接, 人人有說色。唯有…數胡人未洽。…因過胡人前, 彈指云:“蘭闍⁹, 蘭闍!”群胡同笑, 四坐並懼。

劉盼遂云:“蘭闍或為梵語之 rañja, 此云樂也¹⁰。”這大約是本於陳寅恪之說¹¹。其後吳其昱更撰專文詳考, 證成陳說¹²。有關主要結論為:王導與西域高僧, 如尸梨密多羅(Srīmitra)¹³, 頗有交往, 必會從他們的通譯學到些許梵文詞語;“蘭闍”只能解釋為 rañja(祈使式、主動態、現在時、第二身、單數), 義猶法語 Sois content(筆者按:略如英語 Do be cheerful)。平田昌司也贊同陳、吳二家之說¹⁴。馬瑞志(Richard B. Mather)注釋《世說新語》此條, 云:“‘蘭闍’當是佛教徒所用梵語(Sanskrit)問候之詞 rañjan ī(略如英語 Good cheer)的俗語(Prakrit)或某種中亞語的說法¹⁵。”說亦相近¹⁶, 王導在

⁹ 此“闍”讀“視遮切”, 或誤讀“當孤切”。如黃遵憲《歲暮懷人詩》三十五首之八:“自笑壺邱儂鄭巫, 有人彈指說蘭闍。四朝盟會文山積, 排比成書有意無?”

¹⁰ 劉盼遂:“世說新語校箋,”《國學論叢》第1卷第4號, 1928, 頁70。

¹¹ 周一良:“中國的梵文研究,”《魏晉南北朝史論集》, 中華書局, 1963, 頁334; 又:《周一良學術論著自選集》, 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5, 頁446; 又:《唐代密宗》, 上海遠東出版社, 1996, 頁153。

¹² Wu Ch' i-yu: “À propos de l' expression *lan-tchō* de la langue *hou* citée dans le *Che-chouo sin-yu*: In Memoriam Tch' en Yin-k' o,” *Études d' histoire et de littérature chinoises offertes au Professeur Jaroslav Praxšek*, Paris, 1976, pp. 303-16.

¹³ 《世說新語·言語》:“高坐道人作漢語。”劉孝標注引《高坐別傳》:“和尚胡名尸梨密, 西域人, …丞相王公一見奇之, 以為吾之徒也。…性高簡, 不學晉語, 諸公與之言, 皆因傳譯。”慧皎《高僧傳》卷一“帛尸梨密傳”略同。

¹⁴ 平田昌司:“謝靈運‘十四音訓敍’の系譜,”高田時雄編《中國語史の資料と方法》,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1994, 頁33—4。

¹⁵ R. B. Mather: *Shih-shuo Hsin-yü: A New Account of Tales of the World*,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6, p. 86.

¹⁶ “蘭闍”還有其他解釋。參看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札記》, 中華書局, 1985, 頁119; 俞敏:“佛教詞語小議,”《俞敏語言學論文集》, 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1989, 頁337; 饒宗頤:“關於世說新語二三問題·蘭闍,”《唐君毅先生紀念論文集》, 臺北:學生書局, 1983。

這樣的場合行了胡人的“彈指”之禮¹⁷，同時說了一個胡語的詞，顯然是政治家的刻意作態。《世說新語》的撰者把這一軼事歸入“政事”門，良有以也。

酈道元《水經注》卷二“河水”：“巖堂之內，每時見神人往還矣。…俗人不悟其仙者，乃謂之神鬼。彼羌目鬼曰‘唐述’，復因名之為唐述山，指其堂密之居，謂之唐述窟。…”

據卜弼德（Peter A. Boodberg）考證¹⁸，“唐述”乃是突厥—蒙古語（turco-mongol）tangsuq 的蒙語複數形式 *tangsut 的譯語，義為 supernatural thing（超自然之物，“神鬼”）。

白居易《新樂府·陰山道》：“陰山道，陰山道，紇邏敦肥水泉好。”

據陳寅恪考證¹⁹，“紇邏敦”是突厥語：“紇邏”為 kara 之音譯，義為“玄黑或青色”；“敦”為 tūna 之對音簡譯，義為“草地”²⁰。這裏詩人用了當地回鶻人語言裏的兩個詞，大約為的是點染一點本地風光和民族色調。

白居易《新樂府·蠻子朝》：“清平官持赤藤杖，大軍將繫金呿嗟。”

唐樊綽《蠻書》卷八：“[南詔]謂腰帶曰佉苴。”又：“帶謂之佉苴。”《新唐書》卷二二二上“南蠻傳·南詔”：“佉苴，韋帶也。”又：“自曹長以降繫金佉苴。”“呿嗟”即“佉苴”，是當時雲南民族語言裏的一個詞。比較今白語 t×vt×v（帶）。

元代漢蒙民族接觸密切，因而出現漢語裏夾用蒙古語的情況，常見於當時的劇曲作品裏。例如：

元無名氏《像生番語罌罌旦》²¹第三折第四曲“窮河西”：“皓首蒼顏老宣差，駕車的心叻怯。都麻呢咬兒只不毛兀刺（Tümen-i yor×i bu ma`ula）！你與我請過來。”又第五曲“播海令”：“為男兒不在，帳房裏沒甚麼…沒甚麼東西，東西的這五隔（ügei）²²。”

¹⁷ 彈指為天竺人表示高興、讚美等感情的一種動作。周一良上引文云：“隋唐以後胡梵兩字的分別漸嚴。胡專指中亞胡人，梵指天竺。六朝時期胡的用途還很廣，印度也每每被稱為胡。”張毅亦云：六朝以前印度也可稱為胡，隋以後所謂胡始不包括印度而僅指中亞及北亞各族。見《往五天竺國傳箋釋》，中華書局，1994，頁92。

¹⁸ P. A. Boodberg: “Two Not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Frontier,”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1, nos. 3-4, 1936, p. 305, n. 74. 卜氏僅引《太平寰宇記》卷一五一，未及《水經注》。

¹⁹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頁255—6。

²⁰ W. Radloff: *Versuch eines Wörterbuches der Turk-Dialekt* (4 Bände, 1893—1911), St. Petersburg, Bd. 2, S. 132, Bd. 3, S. 1440.

²¹ 明張祿輯《詞林摘艷》，文學古籍刊行社，1955，頁324—7；趙景深輯《元人雜劇鈎沈》，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6，頁132—4。

²² 參看 Arthur Waley: “Chinese-Mongol Hybrid Song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都麻”義為“萬戶”，“咬兒只”義為“走”，“毛兀”義為“煩惱，相怪”；“都麻呢咬兒只不毛兀刺”大意是“萬戶爺，走吧！別見怪！”“五隔”義為“沒有”。

像上述這一類出現在中古和近代作品裏的外族語詞大抵只用於某種特定場合，也未必都能算作漢語裏的外來詞。

3.0 在歷史上漢語裏的外來詞有兩大宗²³：一是從晚漢到唐代通過佛典翻譯傳入的源自古印度語言和古中亞語言的詞語；一是近百餘年來隨着歐風美雨而傳來的以英語為主的現代印歐語的詞語。前一類外來詞為數不算少，但能走出佛教著作的範圍的很有限；後一類外來詞產生之後往往又為自創的新詞（包括仿譯詞）所取代，通行開來的為數並不很多。這兩類外來詞都已經研究得比較充分，並各有專書著錄。

3.1 現在看來，更加值得廣泛搜集、深入研討的倒是那些散見於歷代各類作品的語源不一需要考定的外來詞。下面試就常見習讀的唐宋詩詞舉幾個名物詞（文化詞）為例，略作討論。

白居易《新樂府·澗底松》：“君不見，沈沈海底生珊瑚，歷歷天上種白榆。”

李商隱《碧城》詩三首之三：“玉輪顧兔初生魄，鐵網珊瑚未有枝。”

章鴻釗在寫成於1930年的《寶石說》一書中指出²⁴，“珊瑚”之名始見於西漢初。陸賈《新語·道基》²⁵：“琥珀、珊瑚、翠羽、珠玉，山生水藏，擇地而居。”但章氏此說長期不為人所知。後來中外學者所能找到的“珊瑚”的最早出處是司馬相如《上林賦》：“玫瑰碧琳，珊瑚叢生。”大型辭書也多引此為始見書證²⁶。依據史籍記載（見下“琥珀”條），在古代珊瑚是西域的出產，中國的珊瑚大約是從西域傳來的。但是在西亞語和伊朗語裏找不到跟“珊瑚”對應的詞。因此對於“珊瑚”是否外來詞學者們往往遊移其辭。如勞費爾（Berthold Laufer）說：“漢語‘珊瑚’或許是起源於外國語，或許不是²⁷。”章鴻釗說：“意者‘珊瑚’之名本中國語而非外國語也²⁸。”但 Janusz

African Studies, Vol. 20, 1957, pp. 581-4; 方齡貴：《古典戲曲外來語考釋詞典》，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1，頁247—9。

²³ 漢語借用日語漢字詞為另一種特殊情況，不在此列。

²⁴ 章鴻釗：《石雅》《寶石說》（合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頁540。

²⁵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九一“子部一·儒家類一”以陸賈《新語》為後人偽託之作。但余嘉錫力辨此書並非贗作。見《四庫提要辨證》（1958）第2冊，中華書局，1980，頁524—38。

²⁶ 遲至1996年尚有學者說：“我國載籍最早著錄珊瑚者為《史記》卷一一七‘司馬相如傳’載《上林賦》。”見楊博文：《諸蕃志校釋》，中華書局，頁201。

²⁷ B. Laufer: *Sino-Iranica: Chinese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Ancient Ira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History of Cultivated Plants and Products*, Chicago, 1919;

Chmielewski 力主“珊瑚”為外來詞說²⁹。他認為：伊朗人在很古的時候就知道珊瑚並把它視為珍品，而中國人跟伊朗人接觸又為時甚早，因此“珊瑚”一詞很可能是源自伊朗語。雖然在伊朗語裏未能找到相當於“珊瑚”的特定的詞，但是“東方人總是把珊瑚當作寶石³⁰，”古代伊朗人特別是中亞的伊朗人必定也是如此³¹。因此“珊瑚”可能是伊朗語指稱“(美)石”的一個詞的對音，而這個詞就是淵源古遠的 sāng<*(a)sanga。其後薛愛華(Edward H.Schafer)和馬瑞志(R.B.Mather)也都承用其說³²。

李白《客中行》：“蘭陵美酒鬱金香，玉碗盛來琥珀光。”李商隱《題僧壁》詩：

“蚌胎未滿思新桂，琥珀初成憶舊松。”

依上引章鴻釗之說，“琥珀”之名也是始見於陸賈《新語·道基》。據史籍記載，跟珊瑚一樣，琥珀也是出產於西域。《漢書》卷九六上“西域傳上”：“罽賓，…出珠璣、珊瑚、虎魄。”《後漢書》卷一一八“西域傳”：“大秦國…有…珊瑚、琥珀。”《梁書》卷五四“諸夷傳”：“中天竺…多大秦珍物，珊瑚、琥珀。”《魏書》卷一〇二“西域傳”：“波斯國…出珊瑚、琥珀。”《周書》卷五〇“異域傳下”、《北史》卷九七“西域傳”略同。《隋書》卷八三“西域傳”：“波斯國…多獸魄³³、珊瑚。”《南史》卷七九“夷貊傳下·西域”：“波斯國…亦有武魄³⁴。”看來“琥珀”可能是個外來詞，但原語不明。綜合夏德(Friedrich Hirth)、卜弼德(P.A.Boodberg)、薛愛華(E.H.Schafer)三家之說³⁵，它大約是來自西亞或南亞某種語言的一個詞，其原始形式當是*xarupah，而這個詞又跟古羅馬博物學家 Pliny 提到的“敘利亞語” harpax 有關聯。

林筠因漢譯本《中國伊朗編》，商務印書館，1964/2001，頁355。

²⁸ 章鴻釗：前揭書，頁540。

²⁹ J.Chmielewski: “Two Early Loan-words in Chinese,” *Rocznik Orientalistyczny*, Vol. 24, no. 2, 1960, pp. 53-6.

³⁰ 《中國伊朗編》，頁353。

³¹ 古代中國人也是如此。如西漢桓寬《鹽鐵論·力耕》：“美玉、珊瑚，出於昆山。”直到明代李時珍著《本草綱目》也還把珊瑚歸在卷八“金石部”。對此章鴻釗在《寶石說》中曾解釋說：“琥珀與珊瑚，考其實皆非石類，蓋一為植物之脂液，一乃動物之遺蛻也。…而世之用作寶石類已久。”（頁540）

³² E. H. Schafer: *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 A Study of Tang Exotic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1985, p. 246; R. B. Mather: op. cit., p. 649. 楊博文謂“珊瑚”乃波斯語名 xuruhak 之訛省。（前揭書，頁201）其說繆悠，可不置論。

³³ 唐人避諱，改“虎”為“獸”或“武”。

³⁴ 同上注。

³⁵ F. Hirth: *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 Researches into Their Ancient and Mediaeval Relations as Represented in Old Chinese Records*, Leipzig and Munich, 1885, p. 245; P. A. Boodberg: “Some Proleptical Remarks on the Evolution of Archaic Chinese,” *HJAS*, Vol. 2, 1937, p. 359, n. 60; E. H. Schafer: *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 p. 247.

杜甫《贈田九判官》詩：“宛馬總肥春苜蓿，將軍只數漢嫫媧。”李商隱《茂陵》詩：“漢家天馬出蒲梢，苜蓿榴花遍近郊。”

勞費爾(B.Laufer)認為苜蓿這種植物的種子和“苜蓿”這個名稱是漢武帝時出使西域的張騫從大宛(Fergana)帶回中國的。當時大宛人講的語言是一種伊朗語方言，所以“苜蓿”應當是源自伊朗語的一個借詞。但這種古伊朗方言已經絕跡，現在在伊朗語裏找不到跟“苜蓿”對應的詞，只能用擬構法重建為*buksuk³⁶。《史記》卷一二三“大宛列傳”：“宛左右以蒲陶為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陶肥饒地。”《漢書》卷九六上“西域傳上”：“大宛左右以蒲陶為酒。…馬耆目宿。…張騫始為武帝言之。…漢使采蒲陶、目宿種歸。”可見苜蓿其物其名的確是武帝時漢使從大宛帶回來的。勞氏之說思路基本上是對的。但J.Chmielewski認為勞說不可靠。在他看來，既然在伊朗語裏找不到跟“苜蓿”對應的詞，就應當另尋語源。他認為漢朝的苜蓿也可能來自罽賓(Kashmir)。罽賓也出產苜蓿，漢使就在那裏見到過。當時罽賓人講的語言是一種跟梵語有關聯的印度方言。雖然跟“苜蓿”對應的早期罽賓語詞未能直接找到，但苜蓿是一種產蜜植物，因而梵語稱蜜的詞 māḥṣika 就有可能被用作產蜜植物苜蓿的名稱。漢語“苜蓿”大約就是 māḥṣika 一詞在罽賓的某種方言形式的音譯³⁷。

李賀《宮娃歌》：“象口吹香毼毼暖，七星掛城聞漏板。”

“毼毼”之名東漢初已見記載。《北堂書鈔》卷一三四“服飾部三·毼毼”、《太平御覽》卷七〇八“服用部一〇·毼毼”並引班固《與弟超書》³⁸：“月支毼毼大小相雜，但細好而已。”《御覽》又引杜篤《邊論》：“匈奴請降，毼毼、罽褥、帳幔、氊裘積如丘山。”在東漢以降的典籍裏“毼毼”數見不鮮。《御覽》卷三五八“兵部·鞍”引《東觀漢記》：“景丹將兵詣上，上勞勉丹，出至城外兵所，下馬，坐鞍旃毼上。”《三國志·魏志》卷三〇“烏丸鮮卑東夷傳”裴松之注引魚豢《魏略·西戎傳》：“大秦國…毼毼、罽褥、罽帳之屬皆好。”《後漢書》卷一一八“西域傳”：“天竺國…西與大秦通，有大秦珍物，又有細布、好毼毼³⁹。”李賢注：“〈埤蒼〉曰：毛席也。”玄應《一切經音

³⁶ 《中國伊朗編》，頁36。

³⁷ J.Chmielewski:op.cit.,pp.69-83.

³⁸ 參看原田淑人：“班固の與弟超書に就いて”，《東方學報》（東京）第11冊之一，1940。

³⁹ 參看沙畹(Édouard Chavannes):“Les pays d’Occident d’après le Heou Han chou,” TP vol.8,1907,p.193.沙氏譯“毼毼”為 tapis de laine,是。

義》卷二引服虔《通俗文》：“織毛褥…細者謂之毼毼⁴⁰。”《梁書》卷五四“諸夷傳”：“中天竺…土俗出…毼毼。”《南史》卷七八“夷貊傳上”略同。《魏書》卷一〇二“西域傳”：“波斯國…多…毼毼、毼毼。”《北史》卷九七“西域傳”、《隋書》卷八三“西域傳”同。字又作“毼毼”。《御覽》卷八二〇“布帛部七·白疊”引吳篤《趙書》：“石勒建平二年，大宛獻珊瑚、琉璃、毼毼。”《世說新語·任誕》：“王子猷…詣郗雍州，…見有毼毼。”《周書》卷五〇“異域傳下”：“波斯…又出…毼毼、毼毼。”又作“毼毼”。郭茂倩《樂府詩集》卷七七《樂府古辭》：“行胡從何方？列國持何來？毼毼毼毼五木香，迷迭艾蕪及都梁。”勞費爾（B.Laufer）認為“毼毼”相當於中古波斯語的一個詞，與詞根 *tāb*（紡績）有關，可以擬構為 **tāptā*×/*tāpetān*⁴¹。薛愛華（E.H.Schafer）也認為“毼毼”無疑是一個波斯語名稱，指伊朗的一種羊毛毯，但是他沒有舉出跟“毼毼”對應的波斯語詞⁴²。馬瑞志（R.B.Mather）注釋上引《世說新語》文，也肯定“毼毼”源自伊朗，並指出它在波斯語裏的對應詞當是 *tābīdan*（義為 *spun / woven*）⁴³。

杜甫《石筍行》：“雨多往往得瑟瑟，此事恍惚難明論。”白居易《暮江吟》：“一道殘陽鋪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紅。”又《閑遊即事》詩：“寒食青青草，春風瑟瑟波。”

中古以降史籍對“瑟瑟”多有記述。《魏書》卷一〇二“西域傳”：“波斯國…出…瑟瑟。”《周書》卷五〇“異域傳下”、《北史》卷九七“西域傳”、《隋書》卷八三“西域傳”略同。《新唐書》卷二二一上“西域傳上·于闐”：“初，德宗即位，遣內給事朱如玉之安西，求玉於于闐，得瑟瑟百斤，並他寶等。”又卷二一六上“吐蕃傳上”：“其官之章飾，最上瑟瑟⁴⁴。”《新五代史》卷七四下“四夷附錄第三·于闐”引後晉高居誨《于闐國行程記》⁴⁵：“經吐蕃，…婦人辮髮，戴瑟瑟。”瑟瑟為來自西域主要是波斯的一種寶石（gemstone），“瑟瑟”一詞當是譯語。古代伊朗出產綠松石（turquoise）很有

⁴⁰ 參看徐時儀、梁曉虹、陳五雲：“佛經音義中有關織物的詞語”，《漢語史學報》第2輯，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頁147—8。

⁴¹ 《中國伊朗編》，頁321。

⁴² E. H. Schafer: *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 p. 198.

⁴³ R. B. Mather: op. cit., pp. 385, 655.

⁴⁴ 波斯出產瑟瑟，而吐蕃人與波斯人多有往來（參看王堯：《吐蕃金石錄》，文物出版社，1982，頁58；張雲：《上古西藏與波斯文明》，中國藏學出版社，2005，頁292—300），波斯當是吐蕃輸入瑟瑟的來源地之一。

⁴⁵ 關於此《記》，參看長澤和俊：“高居誨の于闐紀行について”，《東洋學術研究》第16卷第4號，1977；潘吉星：《天工開物校注及研究》，巴蜀書社，1989，頁550。

名⁴⁶。波斯語稱一種質地較粗的綠松石為 *jamsat*，“瑟瑟”大約就是這個詞的對音省譯⁴⁷。在漢語外來詞裏，節取原複音詞後一音節的譯語舊有其例，如把孟語（*Mon*）、泰米爾語（*Tamil*）、馬來語和爪哇語的 *kapal*（航海的大船）音譯為“舶”⁴⁸；把原單音詞行為重言的也有其例，如緬彝語群稱虎為“羅”（*la / lo*）而《山海經·海外北經》作“羅羅”。至於有學者認為“瑟瑟”來自阿拉伯語 *jaza*⁴⁹，則為勞費爾（*B.Laufer*）早已擯棄的誤說⁵⁰，可不置論。綠松石這種寶石呈好看的綠藍色（*greenish blue, bleu-verdâtre*），故“瑟瑟”又由物名引申以指顏色，如上引白居易詩之所見。

岑參《玉門關蓋將軍歌》：“櫪上昂昂皆駿駒，桃花叱撥價最殊。”元稹《望雲驢馬歌》：“登山縱似望雲驢，平地須饒紅叱撥。”

陶宗儀《說郛》卷三引秦再思《紀異錄》：“天寶中，大宛進汗血馬六匹⁵¹：一曰紅叱撥，二曰紫叱撥，三曰青叱撥，四曰黃叱撥，五曰丁香叱撥，六曰桃花叱撥。”據攷證，“叱撥”乃是突厥—蒙古語（*turco-mongol*）*čibar* 的音譯⁵²，原義為：有各種不同顏色或顏色深淺不同的圓形斑點的馬。

王翰《涼州詞》二首之一：“蒲桃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王昌齡《從軍行》七首之二：“琵琶起舞換新聲，總是關山離別情。”

《宋書》卷一九“樂志一”引傅玄《琵琶賦》：“漢遣烏孫公主嫁昆彌，念其行道思慕，故使工人裁箏、筑，為馬上之樂，欲從方俗語，故名曰‘琵琶’。”《太平御覽》卷五八三“樂部二一·琵琶”引傅玄《琵琶[賦]序》：“聞之故老云：…念其行道思慕，使工知音者裁琴、箏、筑、箜篌之屬，作馬上之樂，…以方語目之，故[曰]‘枇杷’也。”由此可見，琵琶不是漢族原有的樂器⁵³，而“琵琶”一名乃是“方語（方俗語）”

⁴⁶ 章鴻釗：前揭書，頁 29。參看劉萬航：“綠松石——最早用於裝飾的寶石，《故宮文物月刊》1：9，1983。

⁴⁷ 蘇繼庠：前揭書，頁 256—7。Wilfrid Stott 在講到南詔的瑟瑟時，也認為瑟瑟大約是綠松石。見“The Expansion of the Nan-chao Kingdom,” *TP*, vol. 50, 1963, p. 214.

⁴⁸ 蘇繼庠：前揭書，“敘論”頁 4。

⁴⁹ 沈福偉：“結緣和埃及寶石貿易，《中華文史論叢》1983年第4輯，頁 265。

⁵⁰ 《中國伊朗編》，頁 345。

⁵¹ 參看蔡鴻生：“唐代汗血馬‘叱撥’考，《唐代九姓胡與突厥文化》，中華書局，1998/2001，頁 225—30。

⁵² 參看 P. A. Boodberg: “Two Not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Frontier,” p. 299, n. 8.

⁵³ 關於琵琶類樂器的起源和歷史，參看 L. E. R. Picken: “The Origin of the Short Lute,” *Galpin Society Journal*, Vol. 8, 1955, pp. 32-42; 又: “T’ang Music and Musical Instruments,” *TP*, vol. 55, 1969; *New Oxford History of Music*, Vol. 1,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pp. 83-134; 岸邊成雄: “琵琶の淵源,” 東洋音樂學會編《唐代的樂器》，東京：音樂の友社，1968; 常任俠: “漢唐

即外族語的譯寫，故起初字無定體。關於中國的琵琶這種樂器，富路特（Luther C. Goodrich）認為它是來自大夏（Bactria）⁵⁴，而李約瑟（Joseph Needham）認為是來自中亞的伊朗化突厥—蒙古人（Turco-Mongols）⁵⁵。至於漢語裏的“琵琶”這個詞，據梅維恒（Victor H. Mair）之說，則是源自波斯語 *barbat*⁵⁶。

李頎《聽安萬善吹觿箏歌》：“南山截竹為觿箏，此樂本自龜茲出。”

觿箏是一種以蘆莖為箏、短竹為管的豎笛，六朝時期從西域傳入漢地。“觿箏”字又作“箏（必）箏”“悲箏”等，無疑是譯音的外來詞：勞費爾（B. Laufer）以為源自突厥語⁵⁷；林謙三則認為源自龜茲語（Koutchien），即所謂吐火羅語 B（Tocharien B）⁵⁸。但跟它對應的原詞迄未確切考明，有待繼續探討。

辛棄疾《鷓鴣天》詞：“燕兵夜妮銀胡鞞，漢箭朝飛金僕姑。”

“胡鞞”字又作“胡箏”。《玉篇》卷一四竹部：“胡箏，箭室。”又作“弧箏”。《廣韻》入聲屋韻：“弧箏，箭室也。出〈音譜〉。”又作“胡箏”。《史記》卷一七“魏公子列傳”司馬貞《索隱》：“鞞音蘭，謂以盛矢，如今之胡箏而短也。”又作“胡祿”。《新唐書》卷五〇：“兵志”：“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祿、橫刀…皆一。”又作“胡盞”。段成式《酉陽雜俎》（脈望館本）卷七“酒食”：“貞元中，有一將軍，…嘗取敗障泥、胡祿修理食之。”《津逮祕書》本、《學津討原》本、《太平廣記》卷二三四“敗障泥”條及《佩文韻府》卷九〇下入聲屋韻引，“祿”並作“盞”。這個詞異寫特多而就漢語又無理據可說，顯然是個譯語。據岑仲勉之說，“胡鞞”當是突厥語 *qurluq*（盛箭之器）的音譯⁵⁹。《玉篇》為梁顧野王撰，《音譜》為北齊李概撰⁶⁰，可見“胡鞞”這個外來詞早在南北朝時期就已經有了。

時期西域琵琶的輸入和發展，”《民族音樂研究論文集》，音樂出版社，1956；韓淑德、張之年：《中國琵琶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⁵⁴ L. C. Goodrich: *A Short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 N. Y., 1963, p. 55.

⁵⁵ J.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 4, pt. 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2, p. 130.

⁵⁶ V. H. Mair: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Standard Mandarin Place-Name ‘Dunhuang’,” 《季羨林教授八十華誕紀念論文集》下卷，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頁927。原田淑人早已指出漢語“琵琶”當源自波斯語 *barbat*/梵語 *bharbhe*。見“正倉院御物に見えたる唐朝風俗の一斑，”《東亞古文化研究》，東京：座右寶刊行會，1940。原田之文梅氏未提及。

⁵⁷ B. Laufer: “Bird Divination among the Tibetans,” *TP*, vol. 15, 1914, p. 89 et seq.

⁵⁸ 林謙三著、錢稻孫譯《東亞樂器考》，音樂出版社，1962/1996，頁375—95。

⁵⁹ 岑仲勉：《隋唐史》上册，中華書局，1982，頁222。P. A. Boodberg 曾舉出蒙古語 *qor-*（箭袋），但未提及漢語“胡鞞”。見“The Language of the T’ o-pa Wei,” *HJAS*, Vol. 1, 1936, p. 173, n. 9.

⁶⁰ 據陸法言《切韻·序》、《隋書》卷三二“經籍志一”、《北史》卷三三“李公緒傳”附“李概傳”。

陸游《書枕屏》詩：“西域兜羅被，南番篤耨香。”陳亮《桂枝香》詞：“任點取，龍涎篤耨。”

錢仲聯注陸詩⁶¹，引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三四“木之一·香木類·篤耨”為說。《本草綱目》此條襲自宋趙汝适《諸蕃志》，錢氏稱引未得其朔。《諸蕃志》卷下“志物·篤耨香”：“篤耨香，出真臘國。其香，樹脂也。…香藏於皮，樹老而自然流溢者，色白而瑩，…名白篤耨…⁶²”更早的記載見於張邦基《墨莊漫錄》卷二：“宣和間，宮中重異香：廣南篤耨、龍涎…篤耨有黑白二種。”字又作“篤儻”⁶³。宋缺名《百寶總珍集》（《玄覽堂叢書》三集本）卷八“篤儻”：“篤儻，…泉廣路客販到，如白膠香相類。…此香氛氤不散。”這樣看來，“篤耨”當是隨同從“南番”（東南亞和南洋群島）輸入這種名貴香料而傳入漢語的一個外來詞，至晚在北宋時就已經有了⁶⁴。但是跟它對應的原語迄未考明。夏德（F.Hirth）共柔克義（William W.Rockhill）撰《諸蕃志譯注》，以見於明馬歡《瀛涯勝覽》“滿刺加”條的“打麻兒香”（馬來語 damar）比對⁶⁵，未是⁶⁶；劉正燾以為源自英語 turpentine⁶⁷，尤非。

以上所舉“珊瑚”“琥珀”“苜蓿”“鼈殼”“瑟瑟”“叱撥”“琵琶”“鬻策”“胡鞞”“篤耨”同為歷史上我國漢族人民在和其他民族交往的過程中吸收的文化詞（Kulturwörter,cultural words,mots de civilisation），它們都是隨同它們所表示的事物傳到漢地而進入漢語的。正如 J.Vendryes 在他的名著 *Le langage:Introduction linguistique à l'histoire*（1921）中所說：“文化詞特別容易借用，它們和它們所表示的事物一起被輸送出去；事物就作為運載工具為它們服務，有時候會把它們帶到遙遠的地方去：remuerba sequuntur（詞跟着物走）⁶⁸。”考明這一類外來文化詞對於漢語詞彙史研究、中國

⁶¹ 錢仲聯：《劔南詩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頁 4057。

⁶² 馮承鈞：《諸蕃志校注》（1940），商務印書館，1956，頁 97；楊博文：前揭書，頁 168。

⁶³ “篤耨”又訛作“篤祿”。方勺《泊宅編》卷上：“兩浙市舶張苑進篤祿香。”

⁶⁴ 至遲在北宋末南宋初篤耨行銷已遠至北方。洪皓《松漠紀聞》卷上：“回鶻…香有乳香、安息、篤耨。”

⁶⁵ F.Hirth and W.W.Rockhill: *Chau Ju-kua: His Work on the Chinese and Arab Trade in the Twelfth and Thirteenth Centuries Entitled Chu-fan-chi*, St. Petersburg, 1912, p. 200.

⁶⁶ 參看伯希和（Paul Pelliot）：“Notes sur Chau Ju-kua de MM.Hirth et Rockhill,” *TP*, vol. 13, 1912, p. 480.

⁶⁷ 劉正燾等：《漢語外來詞詞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84，頁 85。《綜合英漢大辭典》（商務印書館，1928/1937）turpentine 的釋義即為“篤耨香脂”。

⁶⁸ Paul Radin 英譯本 *Language: A Linguistic Introduction to History*, 1925, p. 227；岑麒祥、葉蜚聲漢譯本《語言》，1992，頁 257。

古籍研究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4.1 對於漢語裏的外來詞，前人由於不諳譯語，或則“以音為意”，或則“望字生義”，從而作出許多錯誤解釋⁶⁹，即所謂流俗詞源（*Volksetymologie, folk etymology, étymologie populaire*）的解釋⁷⁰。其以音為意者，例如：

榻登 《太平御覽》卷七〇八“服用部一〇·髡毳”引服虔《通俗文》：“名‘髡毳’者，施大牀之前小榻之上，所以登而上牀也。”劉熙《釋名·釋牀帳》：“榻登，施之承大牀前小榻上，登以上牀。”

批把/枇杷 應劭《風俗通義·聲音》：“以手批把，因以為名。”《釋名·釋樂器》：“枇杷，本出於胡中，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枇，引手卻曰把，象其鼓時，因以為名也。”

悲篥（栗） 何承天《纂文》（高承《事物紀原》卷二引）：鬻篥，“羌胡樂器，出于胡中，其聲悲，本名悲栗。”杜佑《通典》卷一四四“樂四”：“篥，本名悲篥，出于胡中，其聲悲。”其實鬻（篥）篥吹奏出來的音調不一定悲，由上引李頎詩所說“變調如聞楊柳春，上林繁花照眼新”可見。何、杜二家的解釋顯然是以音為意，同時也是望字生義。

闕氏 “闕氏”為匈奴單于之妻的稱謂，始見於《史記》卷一一〇“匈奴列傳”。《說文》十二上門部：“闕，遮攤也。從門於聲。”大徐音“烏割切”。段注謂“闕”與“遏”音義並同。“闕”當讀陰/入聲。“闕氏”的“闕”也應如此讀。西漢安定郡有闕氏縣，見《史記》卷一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漢書》卷一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據趙一清、王念孫考證⁷¹，此即《漢書》卷二八下“地理志下·安定郡”的烏氏縣。這也是當時“闕氏”的“闕”讀陰聲的顯證。但自王充以來，此“闕”字又有陽聲一讀。《漢書》卷六八“金日磾傳”：“日磾母…病死，詔圖畫於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闕氏’。”《論衡·亂龍》記同一事云：“母死，武帝圖其母於甘泉殿上，署曰‘休屠王焉提’。”又《漢書》卷八“宣帝紀”：“[五鳳]三年，單于闕氏、子孫昆弟…將衆五萬餘來降歸義。”顏師古注：“服虔曰：闕氏，音焉支。”“闕氏”一詞自是匈奴語，但語源不詳。白鳥庫吉

⁶⁹ 錢鍾書：《管錐編》第4冊，中華書局，1979，頁1458。

⁷⁰ 時至晚清，海通已久，尚有文人學士昧於時務，妄解譯語。如平步青《霞外攬屑》卷二釋“亞細亞洲”云：“‘亞’者，〈爾雅·釋詁〉云‘次也’，…‘細’者，…〈玉篇〉云‘小也’：華語‘次小次洲’也。其侮中國極矣！”若此之類，不在本文討論之列。參看錢鍾書：前揭書，頁1461。

⁷¹ 王念孫《讀書雜誌》卷四“漢書二”。

主張匈奴語與通古斯語 (Tungusic) 同族，以為“闕氏”是通古斯語 *äsi* (義為“妻”) 的對音⁷²。這是取“闕”的陰聲一讀。我國古人最先提出“闕氏”的語源解釋的是東晉習鑿齒。他在《與燕王書》(《史記·匈奴列傳》司馬貞《索隱》引)中說：“山下有紅藍。…北方人採取其花，染緋黃，採取其上英鮮者作煙肢，婦人將用為顏色。…匈奴名妻作‘闕支’，言其可愛如煙肢也。闕音煙，想足下先亦不作此讀(漢書)也。”可見當時有學問的人並不讀“闕”為“煙”。焉支山出產紅藍 (safflower)，匈奴人用它的花或漿果來製作婦女用的化妝品，這可能是事實。但這與單于之妻的稱謂並無關聯。習氏取“闕”的陽聲一讀，以“闕氏”牽合“焉支(山)”，又由此而及於此山出產的紅藍，再及於紅藍的一種製品。其說展轉牽附，實不可信。對此顏師古已有批評，見《匡謬正俗》卷五“闕氏”條⁷³。錢鍾書也以習鑿齒對音譯異族語附會解釋為“舞文小慧”⁷⁴。蒲立本 (E.G.Pulleyblank) 則直指習氏的說法“最多只是一個流俗詞源解釋”⁷⁵。

其望字生義者，例如：

虎魄 李時珍《本草綱目》卷三七“木部·琥珀”：“虎死，則精魄入地化為石，此物狀似之，故謂之‘虎魄’。”

牧宿 《本草綱目》卷二七“菜之二·苜蓿”：“苜蓿，郭璞作‘牧宿’，謂其宿根自生，可飼牧牛馬也。”

沐猴 《史記》卷七“項羽本紀”：“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裴駟《集解》：“張晏曰：沐猴，獼猴也。”“沐猴”之“沐”為藏緬語 *m(j)uk* (猴/猴) 的記音字，“沐猴”是由非漢語成分加漢語成分構成的“合璧詞”⁷⁶。《本草綱目》卷五一下“獸部·獼猴”：“猴好拭面如沐，故謂之‘沐’。”“沐猴”一詞在古籍裏又寫作“母猴”。段注《說文》，

⁷² 白鳥庫吉：“西域史上之新研究，”《西域史研究》上册，東京，1941；漢譯文見王古魯：《塞外史地論文譯叢》第2輯，商務印書館，1940。白鳥的解釋自然僅可備一說。因為正如 Otto J. Maenchen-Helfen 所說，“迄今把匈奴的詞語、稱號和名字與突厥語、蒙古語、通古斯語、‘阿爾泰語’勘同 (identify) 的所有嘗試全都是不成功的。”見“The Ethnic Name Hun,” Søren Egerod and Else Glahn (eds.): *Studia Serica Bernhard Karlgren Dedicata*, Copenhagen, 1959, p. 225. 晚近何星亮、劉文性對“闕氏”也有所論考，分見“匈奴語試釋，”《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82年第1期，頁6—7、“‘闕氏’語義語源及讀音之思考，”《西北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頁248—55，無煩引述。

⁷³ 秦選之：《匡謬正俗校注》，商務印書館，1936，頁33—4。

⁷⁴ 錢鍾書：前揭書，頁1458。

⁷⁵ E.G.Pulleyblank: “The Consonantal System of Old Chinese,” *Asia Major* (n.s.), Vol.9, pt.2, 1963; 潘悟雲、徐文堪漢譯本《上古漢語的輔音系統》，中華書局，1999，頁197。

⁷⁶ 詳見拙撰“語源探索三例·‘沐猴’解”(1988)，《語文學論集》(增補本)，語文出版社，1999，頁269—72。

謂“母猴”與“沐猴”為一語之轉，非謂牝者。“沐猴”若如李時珍之所解釋，則於“母猴”又將何說？

果布 《史記》卷一二九“貨殖列傳”：“九疑、蒼梧以南至儋耳者，…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瑇瑁、果、布之湊⁷⁷。”《集解》：“韋昭曰：果，謂龍眼、離支之屬；布，葛布⁷⁸。”《史記》這裏列舉的是南海的珍貴物產的具體名目，“果布”看來不是分指果子、布類，而是一個複音譯語，跟並列的“瑇瑁”一樣⁷⁹。古代南亞、東南亞和南洋群島所產名貴香料和藥材“龍腦”，梵語名 karpūra，馬來語名 kapur 或 kapur barus⁸⁰。“果布”大約就是 kapur 的譯語⁸¹，也就是《酉陽雜俎》卷一八“廣動植之二·木篇”稱龍腦香樹為“固（伯希和疑為“箇”之誤）不婆律”（kapur barus）的“固不”⁸²。

罽罟 明李禎《剪燈餘話》卷四《至正妓人行》：“銀環約臂聯條脫，彩綫綉絨綴罽罟。”“罽罟”是蒙古貴族婦女戴的一種冠飾⁸³，在南宋和元明人著作中常見⁸⁴，又寫作“罽罟、罽罟、罽姑、姑姑、故故、故姑、固姑、顧姑”。顯然這是一個源自蒙古語的外來詞⁸⁵。早年白鳥庫吉曾主張它是蒙古語 kükül 的對音⁸⁶，晚近蒲立本

⁷⁷ 句讀依中華書局標點本《史記》，頁3268。

⁷⁸ 《漢書》卷二八下“地理志下·粵地”顏師古注引韋昭說同。

⁷⁹ 關於瑇瑁，參看薛愛華（E. H. Schafer）：*The Vermilion Bird: Tang Images of the South*,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1985, p. 215.

⁸⁰ H. Hirth and W. W. Rockhill: op. cit., p. 194; P. Pelliot: op. cit., pp. 474-5; 馮承鈞：前揭書，頁91-2；楊博文：前揭書，頁168-9。

⁸¹ 參看周連寬、張榮芳：“漢代我國與東南亞國家的海上交通和貿易關係”，《文史》第9輯，1980，頁24-5。

⁸² 《梁書》卷五四“諸夷傳·海南”：“狼牙脩國…偏多竊、沈、婆律香等。”“婆律”自是馬來語 barus/baros 的音譯。陶弘景《名醫別錄》（《政和證類本草》卷一三引）稱龍腦香樹為“波律樹”。“波律”顯為孟語（Mon）paròt（龍腦香）的音譯。關於狼牙脩國，參看嚴崇潮：“狼牙脩古國考”，黃盛璋主編《亞洲文明》第三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頁175-82。

⁸³ 參看施古德（Gustave Schlegel）：“Hennins or Conical Lady's Hats in Asia, China and Europe,” *TP*, vol. 3, 1892, pp. 427-8；江上波夫：“蒙古婦人の冠帽‘顧姑’について”，《ニューラシア北方文化の研究》，東京，1951，頁221-55；夏鼐：《真臘風土記校注》，中華書局，1981/2000，頁100-1。

⁸⁴ 參看王國維：《蒙鞑備錄箋證》，頁17下-18上；又：《黑鞑事略箋證》，頁6下-7上；又：《長春真人西遊記校注》，頁18；Н. Ц. Мункуев：*Мэн-да Бэй-лу (Полное описание)*

ни е Монголо-татар), Москва, 1975, стр. 191; E. Haenisch et al.: *Meng-ta pei-lu und Hei-ta shih-lüeh (Asiatische Forschungen, Bd. 56)*, Wiesbaden, 1980.

⁸⁵ 參看黃時鑿：“釋〈至正妓人行〉中的蒙古語及其它”，《文史》第23輯，1984，頁207-8；方齡貴：前揭書，頁309以下。

⁸⁶ 白鳥庫吉：“高麗史に見えたる蒙古語の解釋”，《東洋學報》第18卷第2號，1929。參看夏鼐（前揭書，頁100）引伯希和（P. Pelliot）說。

(E.G.Pulleyblank)也認為“這必是蒙古語詞 *kökül* 的音譯”⁸⁷。而有的學者昧於新知，拘守舊文，對這個詞作了十分錯誤的解釋。如周楞伽注《至正妓人行》云：“罟罟一魚網。這裏似指女子所佩的香囊，用絨綫結成網形”⁸⁸。

渾不似 這是宋元時代我國西北地區流行的一種撥絃樂器⁸⁹，形似琵琶而較狹小。宋俞琰《席上腐談》卷上作“胡撥四”“渾不似”，元陶宗儀《輟耕錄》卷二八作“渾不似”，元楊瑀《山居新話》卷二作“胡不四”，《元史》卷七一“禮樂志五·宴樂之器”作“火不思”，他書又作“胡不思、胡撥思、湖撥四、吳撥四、虎撥思、虎拍思、虎拍詞、琥珀詞、和不斯、和必斯”⁹⁰。據福赫伯(Herbert Franke)考證，這個詞是突厥語 *qubuz* 的音譯⁹¹。前人不得其解，遂依漢字為說。如俞琰云：“琵琶…胡人重造，而其形小，昭君笑曰：‘渾不似！’今訛為‘胡撥四’。”

特健藥 唐張彥遠《法書要錄》卷三“武平一‘徐氏法書記’”：“至中宗神龍中，貴戚寵盛，宮禁不嚴，御府之珍多入私室，先盡金璧，次及法書。…或有報安樂公主者，主於內出二十餘函。駙馬武延秀久踐虜廷，…乃呼薛稷、鄭愔及平一評其善惡。諸人隨事答稱，為‘上’者，登時去牙軸、紫褱，易以漆軸、黃麻紙褱，題云‘特健藥’，云是虜語。”唐韋續《墨藪》載“徐氏書紀”、宋陳思《書苑菁華》卷一三“唐武平一‘徐氏法書記’”略同。元陸友《研北雜志》卷下：“顏魯子侍郎之孫家有鍾紹京書《黃庭經》，紙尾題‘特健藥’三字。”品題法書的“特健藥”，當時人武平一就說是“虜語”。據《舊唐書》卷一八三“武承嗣傳”，武延秀於則天時奉使突厥，久不得還，神龍初始得歸，“延秀久在蕃中，解突厥語。”可見所謂“虜語”必定是突厥語⁹²。清人王士禛不得其解，遂依漢字作釋。《香祖筆記》卷一二：“《輟耕錄》言：或題畫為‘特

⁸⁷ E.G.Pulleyblank: "The Chinese and Their Neighbors in Prehistoric and Early Historic Times," pp. 453-4; 又:《上古漢語的輔音系統》，頁193。

⁸⁸ 周楞伽校注《剪燈新話》(外二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頁266。

⁸⁹ 林謙三：前揭書，頁238-43。

⁹⁰ 參看方齡貴：前揭書，頁198—301。

⁹¹ H. Franke: "Some Remarks on Yang Yü and His *Shan-chü Hsin-hua*,"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Vol. 2, no. 2, 1955; 又: *Beiträge zur Kulturgeschichte Chinas unter der Mongolenherrschaft. Das Shan-kü sin-hua des Yang Yü*, Wiesbaden, 1956. 參看 P. Pelliot: "Le *k' ong-heou* et le *qubuz*," 《內藤[虎次郎]博士還曆祝賀支那學論叢》，京都：宏文堂，1926。P. A. Boodberg 曾舉出突厥語 *qobuz* 和來自突厥語的俄語 *к о б з а*，但未提及它的漢語名稱。見 "The Language of the T 'o-pa Wei," p. 174.

⁹² Achilles Fang (方志彤)亦云：“‘特健藥’必定是唐代通行的一个突厥語詞的漢語對音。”見 "Bookman's Decalogue (藏書十約)," *HJAS*, Vol. 13, nos. 1-2, 1950, pp. 172-3, n. 159.

健藥’，不喻其義。予因思昔人如秦少游觀‘輞川圖’而愈疾，而黃大癡、曹雲西、沈石田、文衡山輩皆工畫，皆享大年，人謂是‘煙雲供養’⁹³，則‘特健藥’之名不亦宜乎！”王氏把“特健藥”解為特別有益於健康之藥，顯為附會。《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二二“子部三二·雜家類六”“香祖筆記”條、梁章鉅《浪跡叢談》卷九“特健藥”條都已指出王氏此說為“以字義穿鑿”之誤。“特健藥”無疑是唐代傳入的譯語，只是跟它對應的確切的突厥語詞尚待考明⁹⁴。

4. 2 與上述相反，也有把非外來詞誤認為外來詞的事例，如：

老瓦 杜甫《少年行》二首之一：“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明末清初人王餘祐在他的《五公山人集》裏講到杜甫此詩時認為“老瓦盆”的正確屬讀應是“老瓦盆”。“老瓦”為西洋人呼“月”之詞，“老瓦盆”即“月盆”，如“月琴”“月臺”之類，取其形似⁹⁵。現在想來，這個音為l-a而義為“月”的西洋語詞當非拉丁語luna莫屬。這就是說，杜甫懂拉丁文⁹⁶，“老瓦”是譯音的外來詞。

渾脫 “渾脫”在唐代指一種形狀特別的帽子和頭戴這種帽子的藝人表演的舞蹈或由他們組成的舞隊，在宋元明時代一般指一種盛水漿、飲料的容器和充了氣用以渡水的皮袋或革囊。長期以來學者們都把“渾脫”看作譯音的外來詞。現代外國學者更進而確認這一看法。如羽田亨於1933年撰文，主張“渾脫”是蒙古語*hu×uta>huta（囊，袋子）的音譯⁹⁷。我國一些學者也承用其說。直到1981年著名蒙古學家司義律（Henry Serruys）才率先指出“渾脫”並非外來語，而純粹是一個漢語詞，其語源義為“完整地剝脫（動物的皮）”⁹⁸，筆者繼而撰文，加以推闡，證成其說⁹⁹，看來可為定論¹⁰⁰。

⁹³ 明陳繼儒《妮古錄》卷三：“黃大癡九十而貌如童顏，米友仁八十餘神明不衰，…蓋畫中煙雲供養也。”

⁹⁴ 參看劉銘恕：“美術辭典中之外來語‘特健藥’，《說文月刊》第4卷，1944，頁823-4；岑仲勉：《突厥集史》下冊，中華書局，1958，頁1090-3。

⁹⁵ 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八一“集部別集類存目·五公山人集”。參看錢鍾書：《管錐編》第2冊，頁681。

⁹⁶ 清末經師廖平謂孔子通英文、法文（江庸《趨庭隨筆》，引見錢鍾書：前揭書，頁681），當代作家端木蕻良謂曹雪芹通日文、拉丁文，尤精英文，曾觀莎劇之演出（文載《新華文摘》1984年第4期）。奇談怪論，殆皆王餘祐謬說之支與流裔也。

⁹⁷ 羽田亨：“舞樂の渾脫といふ名稱について，《羽田博士史學論文集》下卷，京都，1958，頁526-30；楊鍊漢譯文“論舞樂之渾脫”，《古物研究》，1936，頁143-8。

⁹⁸ H. Serruys: “*Hun-t 'o:tulum*, Floats and Containers in Mongolia and Central Asia,” *BSOAS*, Vol. 44, pt. 1, 1981, pp. 105-19.

⁹⁹ 拙撰“語源探索三例·‘渾脫’考”（1988），《語文學論集》（增補本），頁262-9。

¹⁰⁰ 見《漢語大詞典》“渾脫”條。參看徐文堪：“略論〈漢語大詞典〉的特點和學術價值，《辭書研

5.1 在詞語借用中還有一種特殊現象：先是外族語借用漢語的一個詞，後來漢語又把這個詞倒借回來；在這一出一入之間，詞的字形、語音、意義或用法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改變。這一類回歸的“貸詞”，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也應屬之漢語外來詞之列。例如：

把勢（把式）<突厥語 *ba×ši*/蒙古語 *ba×si*/滿語 *bahši*¹⁰¹，指精通某種技術或手藝的人，如“鷹把勢”¹⁰²“車把勢”“瓜把勢”“花兒把勢”。而突厥語、蒙古語、滿語裏的這個詞又是直接或間接源自漢語的“博士”。自唐迄明“博士”可指從事某種專業或擅長某種技藝的人¹⁰³，猶今語“師傅”。

喇叭<突厥語 *labay*/蒙古語 *labai*。而突厥語、蒙古語的這個詞又是源自漢語的“螺貝”¹⁰⁴。

福晉<滿語 *fujin*。清朝親王、郡王及親王世子的正妻的稱號。而滿語的這個詞又是源自漢語的“夫人”¹⁰⁵。

鯨<爪哇語 *×ong*/馬來語 *jong*¹⁰⁶，義為“船隊”。元宋無《鯨背吟》（見陳衍《元詩紀事》卷九）：“前船去速後鯨忙，暗裏尋鯨認火光。”明馬歡《紀行》詩（載《瀛涯勝覽》卷首）：“自此分鯨往錫蘭，柯枝古里連諸番。”而爪哇語、馬來語的這個詞又是源自漢語閩南方言的“船”。

颱風<英語 *typhoon*。而英語的這個詞又是源自漢語粵方言的“大風”¹⁰⁷。

究》1994年第3期，頁42-3。

¹⁰¹ 據柯立夫 (Francis W. Cleaves) 之說，引見 Lien-sheng Yang (楊聯陞): “Buddhist Monasteries and Four Money-raising Institutions in Chinese History, ” *HJAS*, Vol. 13, nos. 1-2, 1950, p. 186, n. 42. 參看 Denis Sinor: “突厥語 *baliq* (城市) 一詞的來源,” 北京大學歷史系民族史教研室譯《丹尼斯·塞諾內亞研究文選》，中華書局，2006，頁352；張清常：“漫談漢語中的蒙語借詞,”《中國語文》1978年第3期，頁197；劉銘恕：“現代漢語中的一個蒙古語——把式,”《鄭州大學學報》1983年第4期，頁119-21；方齡貴：前揭書，頁349-61。

¹⁰² 石泰安 (Rolf A. Stein): “*Leau-tche* (遼志) traduit et annoté,” *TP*, vol. 35, 1940, p. 97, n. 2; 顧學頤、王學奇：《元曲釋詞》第1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頁38-9。

¹⁰³ P. Pelliot: “Notes sur le ‘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 de M. W. Barthold,” *TP*, vol. 27, 1930, pp. 14-5; 蔣禮鴻：《敦煌變文字義通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頁43-6。

¹⁰⁴ P. Pelliot.: “Quelques transcriptions chinoises de noms tibétains,” *TP*, vol. 16, 1915, pp. 20-2.

¹⁰⁵ 聶崇岐：“滿官漢釋,”《燕京學報》第32期，1947，頁100。

¹⁰⁶ P. Pelliot: “Les grands voyages maritimes chinois au début du XVe siècle,” *TP*, vol. 30, 1933, pp. 446-7; 蘇繼頤：前揭書，“敘論”頁4。

¹⁰⁷ 參看施古德 (G. Schlegel): “Etymology of the Word *taifun*,” *TP*, vol. 7, 1896, pp. 581-5; 羅常

全面地搜集探討這一類詞將能為語言學、歷史學的研究提供很有價值的資料。

培：《語言與文化》（1950），語文出版社，1989，頁 33；林紹豪：“颱風詞義考原，”洪國平編《地理論文集》，新加坡南洋學會，1972；Yuan Jiahua（袁家驊）：“English Words of Chinese Origi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Vol. 9, no. 2, 1981, pp. 273-81；李榮：“颱風的本字，”《方言》1990 年第 4 期，1991 年第 1、2 期。

Aspects of the Loanwords in Chinese

Zhāng Yǒngyán

Abstract: In the present paper the author tries to make a survey of the main aspects of the loanwords in Old, Mediaeval and Pre-Modern Chinese. Emphasis is laid on the cultural words of foreign origins introduced into Chinese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For not a few of them the exact etymologies are still obscure, thus requiring elucidation. In the meantime, due attention is paid to some cases of folk etymology which are worthy of notice. It is hoped that the opinions and examples given in this paper will be of some value to students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vocabulary and related research fields.

Key Words: loanwords, cultural words, etymology, folk etymology, history of Chinese vocabulary

理論與事實：語言接觸視角下的 中古譯經語法研究

遇笑容*

漢語語法史中發生過多次語言接觸，對漢語的歷史發展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中古譯經中的外來影響，是目前研究的主要課題之一，現有的研究側重於從句型和虛詞入手，探討這個時期佛經語言出現過一些什麼樣的改變，這些改變和佛經原典語言—梵文、巴利文—有什麼關係，研究已經逐漸取得了一些進展。但是，對從語言接觸的視角看，這些變化的基本特徵、其發生的過程、機制，以及對漢語造成影響的途徑和最終結果，似乎還沒有一個整體的認識。本文以目前對中古譯經的研究為基礎，試圖對這些問題做一個簡單的討論。

—

中古譯經是伴隨著佛教傳入而產生的。漢代開始，佛教傳入中國，西域僧人也來到中國，為傳播佛教思想，開始把梵文、巴利文的佛教經典翻譯成漢語。譯者雖不能說很多，但譯經數量龐大，僅見於《開元釋教錄》的，譯者有 170 餘人，翻譯佛經近 2300 部，7000 餘卷，5000 餘萬字。

佛經的翻譯者前期基本上是中亞、印度的僧人，雖然在譯場中有漢人的幫助，但譯經仍然不可避免的會在語言上留下佛典原文的影響。影響的程度，依譯者的不同或譯本目的的不同而有所差別。安世高和支謙可以算是前期的代表，《出三藏記集》卷十三載：

安清，字世高，安息國王政後之太子也……世高雖在居家，而奉戒精峻。講集法施與時相續。後王薨將嗣國位，乃深惟苦空厭離名器。行服既畢，遂讓國與叔，出家修道博綜經藏，尤精阿毗曇學。諷持禪經，略盡其妙。既而遊方弘化，遍歷諸國。以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漢桓帝之初，始到中夏。世高才悟機敏，一聞能達。至止未久，即通習華語。於是宣釋眾經改胡為漢，出安般、守意、陰持入經大小十二門，及百六十品等。

支謙，字恭明，一名越，大月支人也。祖父法度，以漢靈帝世，率國人數百歸化，拜率善中郎將……十歲學書，同時學者皆伏其聰敏。十三學胡書，備通六國語。初桓靈世，支謙譯出法典，有支亮紀明資學於謙。謙又受業於亮，博覽經籍莫不究練。世間藝術，多所綜習。其為人細長黑瘦，眼多白而精黃。時人為之語曰：支郎眼中黃，形體雖細是智囊。

二者都是西域人，但安是直接來自西域，出家學佛，來中國傳道。他是到中國之後才學會的漢語，雖然說“才悟機敏一聞能達，至止未久，即通習華語”，但漢語不是他的母語，漢語水準可能不會跟漢人一樣好。支謙是祖父輩已經歸化的西域人，從記述看，他的母語已經是漢語了，“十歲學書。同時學者皆伏其聰敏。”只是他生活的圈子，可能還是歸化的西域人為主，他們來到中國，生活在這裏就免不了要使用漢語，但是，原來的母語，可能仍然在部分人中間保留著，他們的語言也可能仍然是一種母語與漢語之間的一種中介語。如果不是生活在雙語環境中就不可能“十三學胡書。備通六國語。”

晚期隋唐始，漢人出家者增多，開始有人學習梵文，並西行求法，玄奘可以算此類僧人的代表。《舊唐書》卷一九一載：

僧玄奘，姓陳氏，洛陽偃師人，大業末出家，……貞觀初，隨商人往游西域……在西域十七年，經百餘國，悉解其國之語。

目前大家作為中古文獻主要研究的是唐代之前西域譯者的作品，這些譯者無論是像安世高一樣來自西域的和尚，還是像支謙那樣在中國出生的西域人後裔，母語或父祖輩的母語，以及生活環境對其影響都不能低估。大概也正是由於他們對自己的漢語沒有足夠的信心，所以才出現了複雜的譯場制度，有人口授，有人翻譯，有人辯論是否穩妥準確，有人潤色辭藻字句。在這樣一套運做之後，留下的是我們今天所見的漢譯佛經。然而，他們要處理的是一個從內容到形式都與漢語有巨大差別的系統，要把全部佛教思想用漢語表達出來，是一個極其困難的任務，在磨合的過程裏，他們努力尋找合適的表達方式—包括辭彙和句子，但還是常常要創造一些新的辭彙、造出不盡符合漢語語法規則的句子。他們在努力的用漢語表達，但又不自覺的會帶上母語的影響，這大概就是我們今天所看到的中古譯經。

所以，對這些早期西域僧人譯經，我們可以歸納出以下特徵：

- 1, 中古譯經是在漢語對話條件下出現的，主要是操其他語言的人學習漢語的結果；
- 2, 中古譯經是以漢語為目的語的第二語言習得的結果，出現的梵文、巴利文影響，是在不完全第二語言習得中的母語干擾；
- 3, 中古譯經是一種中介語，是母語和漢語之間的一種變體，作為語言學習者運用第二語言進行交際的工具。

（中介語是指學習者在某一階段所建立起來的目的語知識系統，既包含母語的特徵，也包含目的語特徵。它不穩固，是逐漸變化的，在不斷的重組之中逐漸接近目的語。）

晚期唐代以後，玄奘等本土僧人開始介入佛經翻譯活動，其譯經中同樣出現梵文影響，但造成的原因就是多樣的了，既有他們學習梵文過程中的目的語干擾，也有對早期譯經語言繼承和模仿。翻譯過程對他們來說仍然是一個第二語言習得的過程，只不過目的語從漢語變成了梵文，錯誤的性質變成了目的語干擾，同時佛經作為宗教經典以及早期譯經者在這個領域中特殊而又重要的地位，也使得一些逐漸固定下來的辭彙、語法手段，成為後來者模仿的對象，逐漸取得了約定俗成的合法性。就其特徵而言，它仍然是漢語，是以梵文為目的語的第二語言習得的結果，具有一種中介語性質。

二

語言接觸造成語法改變的方式，有干擾和借入兩類。所謂干擾，是指由於一種語言的影響，干擾了另外一種語言的發展方式或過程；借入則是一種語言從另外的語言中借入語法格式或範疇。語言接觸造成的語法改變，是多種多樣的，而造成改變的機制，也是多種多樣的。中古譯經中出現的語法變化，基本上是由第二語言習得引發的。而作為中介語其語法系統雖然包含母語和目的語兩方面的特徵，但它應該是處於向目的語趨近的過程中，它是處於一種連續的變化過程裏。它是一個系統，但同時又是開放的、靈活的。我們把中古譯經看作一個整體（即不計每個整體內時間、個人、翻譯目的的差異，以常見情況為代表），看作漢語的一個變體，概括介紹一下目前的研究成果。

1、外借：云何 kim

梵文疑問標誌，漢語中義為“說什麼”，《撰集百緣經》還可以看到“說什麼”的

用法，中古譯經更多的是在疑問句中充當疑問詞。特殊的是在已經完備的漢語疑問句裏，仍出現在梵文裏原有的當作疑問標誌的句首位置。這些漢語疑問句本來已經是完整的句子了，“云何”的出現是一種冗餘，已經失去了梵文中的疑問功能。這種不表疑問的用法應該是受梵文影響，是譯者母語干擾的結果。遇笑容（2003、2004a、2004b、2004c）

2、外借：將無 mā

語氣副詞“將無”，表示“但願不……”、“該不是……”意思的語氣副詞“將無”的產生與原典有關，是 mā 的對譯。朱慶之（1991b、1992a）

3、外借：故 iti/hi/artha

用於分句末的表原因的“故”。出現在中古譯經小句或句末，“……故，……”或“……，……故”式，如“彼銀色女有所須故，從自家出，往自他舍。（佛陀扇多《銀色女經》）”“是為善知識，多聞經故。（支謙《遺日摩尼寶經》，12/190a）”這種用法的“故”不是漢語固有成分，對譯的是梵文中表示從格的 *iti* 和表原因的從格、具格或不變詞 *hi*，也可能是表目的的名詞 *artha*，這種用法應該是在翻譯中受原典影響而產生的。許理和（1977）高崎直道（1993）王繼紅（2004）

4、干擾結構發展：POV

中古漢語是連動式大量使用的時期，V1O1V2O2 式和省略式 V1V2O 並存。個別動詞（取）在連動式的使用，在譯經中出現變異，產生 V1OV2，並最終導致處置式“提賓”形式的產生。變異來源可能與梵文 SOV 的語序有關，從系統看在中古漢語連動式中，這一變化是不符合規則的、孤立的。這為我們外來干擾的解釋提供了支援。

5、語義制約的消失：VO 已

蔣紹愚等研究指出，漢語中“VO 已”中 V 限於持續動詞，瞬間動詞不能出現，中古譯經中出現瞬間動詞加“已”的用法，這種用法來自對梵文表示完成的兩種詞綴的翻譯。譯經者母語裏“完成”是一個完整的範疇，不管持續與否，表達法都是統一的。在翻譯成漢語時，他們沒有能理解漢語的限制，比照梵文的完成表達，擴大了“已”在 VO 後的出現範圍。這種瞬間動詞後的“已”因梵文影響而產生，並且是動態助詞“了”的前身。

6、外借及重疊：N 是/是 N 是

“S, N 是”式判斷句。如“佛告諸沙門：‘爾時象王者，我身是也。’（《六度集

經》，3/17b)”，江藍生等認為是受梵文影響產生，是梵文語序的反映。梵漢判斷句語序的不同，使佛經中不僅大量出現了“N是”句，同時還出現了梵漢混合的重疊句式“是N是”。

7、使用頻率增長

被動式的使用在譯經中大量增加，對照梵文原本可以看到，很多是來自原文。譯經推動了這些結構的使用數量的增加，也推動了結構的發展完善。

漢語沒有數的變化，但梵文的名詞（包括形容詞和代詞）有單、雙、複數之別。中古譯經中人稱代詞複數的“等”、“曹”的大量使用，可能與原典有關。

中古譯經中新出現了“N所/許”或“N所/許 N”等表示領格的結構助詞“許/所”，如“此果我所，汝等勿取。（竺法護《生經》，3/73c）”“亦不專求自許本衣。（《舊雜譬喻經》）”這些“許/所”可能是用來對譯梵文名詞屬格（genitive）的。這種用法的“所/許”可以在漢語中推導出發展脈絡（江藍生、梁曉虹），但其出現集中在中古譯經，本土文獻用例少且晚，中古以後在本土文獻中迅速消失。這個發展過程中，可能也有梵文的影響。

受事主語句。佛典中的受事主語句使用頻率遠高於中土文獻，可能與梵文中賓語常放在動詞前面有關。

綜合以上7點，可以分為3種情況：1-3是一種外借。“云何/將無/故”都是漢語原來沒有的用法，在翻譯過程中，譯者無法擺脫其母語的影響，將其帶進漢語；4、5是一種干擾，它們用梵文的成分改變了漢語固有的東西，或者是改變了漢語語法成分的發展方向；6是用梵文的詞序代替了漢語的，同時漢梵兩種語序的並存使之出現了混淆和矛盾，於是造成了兩種語序的重疊使用；7包括多種語法現象，這些現象是漢語固有的，梵文的影響只限於在翻譯過程裏，為對譯梵文語法，更多的使用了這些語法現象，改變了使用頻率。這也是一種干擾。

三

在中古譯經造成的大範圍語言接觸中，它對漢語是否造成了影響？如果造成了影響，是通過什麼樣的途徑形成的呢？

我們反復強調，中古譯經只是一種中介語，作為中介，其功能是在兩種不同語言

之間起橋樑的作用，是在進行漢語對話的條件下，沒有學好漢語的時候，用不同程度上存在母語影響的漢語，完成交際活動。既然如此，兩種情況下的母語影響，只是作為中介語的成分存在，它們沒有進入標準的漢語。既然他們都是以漢語為目的語，這些母語影響就是學習中的語言錯誤，需要不斷克服改正，使之日益趨近漢語。因此，我們對中古譯經和元白話所做的平面研究，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梵文、蒙古語影響漢語，其中反映的特殊語言現象和今天外國人學漢語一樣，是第二語言習得中的語言錯誤。而真正意義上的梵文經過語言接觸對漢語造成的影響，是中介語（中古譯經）中的某些錯誤虛詞、結構和句型，隨著中介語在當時社會上的流傳，被漢語所接受，最終進入漢語，成為漢語語法的組成部分。

語言接觸有多種途徑，像人們接觸母語之外的語言時，第二語言習得使其學習的結果成為一種變體；或長期使用其他語言之後，使母語產生變化等等。但是如果沒有特殊的社會歷史背景（如大規模的移民），這些語言接觸不會對其所學習的語言（目的語）產生影響。漢語歷史上兩次大規模的語言接觸，同樣產生了這種變體，這些變體有些和常見的語言接觸結果一樣，作為變體出現，在漢語裏，又作為變體消失（我們不知道對梵文、蒙文它們是不是產生過影響）。但也有些情況不同，變體中的語言錯誤，並沒有隨著時間消失，反而回過頭來又影響到了漢語，干擾了漢語語法的歷史發展。而我們所特別感興趣的，正是這種干擾，它們是什麼，它們是如何起作用的，什麼是它們出現條件，什麼是其發展的機制。

在這個前提下，我們來審視上面述及的中古譯經中的特殊語言現象，我們看到，所有外借的形式可能都沒有保留在漢語裏，它們無一例外的消失了；干擾造成的特殊發展，則有一些被保留下來，成為漢語語法的組成部分。如：

外借：用於分句末的表原因的“故” *iti/hi/artha*

出現在中古譯經小句或句末的“故”不是漢語固有成分，從梵漢對勘看，它對譯的是梵文中表示從格的 *iti* 和表原因的從格、具格或不變詞 *hi*，也可能是表目的的名詞 *artha*，是在翻譯中受原典影響而產生的。

這種用法在譯經中長期使用，成為佛經翻譯者使用的固定格式後，即使是中國譯者，也覺得可以接受，且比較自如的使用。如玄奘在《俱舍論》中就大量使用了。在《俱舍論》真諦本和玄奘本的對比中，我們看到，這種“故”有時玄奘比真諦使用的還多，如：

(真) 各數簡擇苦等聖諦名擇。即智聖因。此所得已利名為擇滅。具足應言擇所得滅。

(玄) 擇謂簡擇即慧差別。各別簡擇四聖諦故。擇力所得滅名為擇滅。

(王) 擇是分別對苦等聖諦的簡擇，擇是特殊的智慧，通過這種智慧所得到的滅是擇滅。

這個句子裏，玄奘用了“故”，真諦沒有用，而且，從梵文本看，這裏並沒有 *iti/hi/artha* 等需要對譯的詞語出現。(資料見王繼紅 2004)

類似的用法在唐五代到宋代，還出現在《祖堂集》《景德傳燈錄》等禪宗語錄裏，如：

知阿難兄有欲漏故，未及眾聖，不得入會。(祖堂集)

眾僧曰：“遮莫是和尚親近故，不禮拜又不吃棒？”《景德傳燈錄》

西域譯經——本土譯經——在本土譯經中擴大使用——本土佛教文獻

“故”的發展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從中介語走向目的語的發展路徑，但是“故”並沒有真正進入漢語，而是止於漢語的本土佛教文獻。

“已”和“取”展示了受梵文影響之後，結構出現變化，並最終進入漢語的結果。雖然我們還沒有發現它們進入的詳細過程，但我們知道，它們開始於佛經中辭彙的結構（結合）關係的改變，進而被更多的人在譯經中使用，再逐漸滲入漢語。進入漢語之後，它們一般都會按照漢語自身的演變規律，繼續其演化過程。從歷史過程看，語言接觸的干擾通常是在一個短暫的時間裏，對漢語的發展過程和方向施加影響，而其結果是使漢語發展的動因多元化，發展路徑複雜化。

我們強調對勘研究，通過對勘使我們能夠瞭解中古譯經的語言面貌，瞭解什麼是梵文帶進漢語的特殊成分。同時我們也要清楚的認識到，中古譯經研究的對象，是一種中介語性質的東西，它只是漢語的一個變體，其“特殊成分”是指其中存在不符合漢語規範、漢語之外的東西。嚴格的說，這些特殊語法成分只是一些外國人學漢語的語言錯誤。認識到這一點，才能對我們的中古譯經研究正確定位。

更需要進一步研究和關注的，是在瞭解中古譯經的語言面貌之後，觀察出現在中古譯經中的特殊語言現象，有哪些、通過什麼途徑對漢語造成了影響，進而影響了漢語語法史的發展。這兩個層面的研究都有待深入，而後一個是研究真正的意義之所在。

四

語言接觸是社會發展作用於語言的結果。

語言接觸造成語言變化的方式是多樣的，漢語語法史中語言接觸的特徵在於，兩次大規模語言接觸都是由操其他語言的人學習使用漢語開始，由於不完全習得產生了變體。這些漢語變體中特殊的語言現象因其不符合漢語規則，多數都逐漸消失了。所以，我們曾經多次指出，這些語言接觸像一個環繞在漢語之外的環，在漢語的外面產生、消失。一般語言接觸，中介語的錯誤不會對目的語產生影響，正如學英語者所犯的語法錯誤不會造成英語變體。漢語不同於一般語言接觸的現象在於：部分漢語變體在某些特殊歷史文化背景和語用原則的支配下，反轉過來影響了漢語的發展，產生了一些新的結構、句型、虛詞。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語言接觸是漢語發展的基本動因之一。

對漢語來說，干擾是發生語言變化的基本方式，產生干擾的原因，是第二語言習得的影響。而真正對漢語造成影響的，是這些干擾被漢語所接受，等於是干擾對漢語發展的再次干擾。

參考文獻：

高崎直道 1993《〈大乘起信論〉的語法：有關“依”“以”“故”等之用法》（釋慧璉譯），《諦觀》第七十二期

王繼紅 2004《基於梵漢對勘的佛教漢語語法研究——以〈阿毗達磨俱舍論·分別界品〉為例》，北京大學博士研究生學位論文

許理和 1987 [1977]《最早的佛經譯文中的東漢口語成分》（蔣紹愚譯），《語言學論叢》（第十四輯），商務印書館

遇笑容 2003《說“云何”》，《開篇》第22卷，（東京）好文出版社

遇笑容 2004a《漢語語法史中的語言接觸與語法變化》，《漢語史學報》第四輯，上海教育出版社

遇笑容 2004b《語言接觸與漢譯佛經的語言性質——從〈撰集百緣經〉談起》，

“第五屆國際古漢語語法研討會”暨“第四屆海峽兩岸語法史研討會”論文集（II）

遇笑容 2006c 《梵漢對勘與中古譯經語法研究》，《漢語史學報》第六輯，上海教育出版社

朱慶之 1991 《“將無”考》，《季羨林教授八十華誕紀念論文集》（上），江西人民出版社

朱慶之 1992 《佛典與中古漢語辭彙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

朱冠明 2005 《中古漢譯佛典語法專題研究》，北京大學博士後研究工作報告

基地建设

中心召开学期末工作例会

7月11日下午，中心在612会议室召开学期末工作例会。参加会议的中心成员有方一新、张涌泉、王云路、颜洽茂、黄笑山、池昌海、许建平、姚永铭、刘锋。中心2007年聘任的两位研究人员关长龙、彭利贞副教授也参加了会议。

方一新主任主持会议，并对一学期来的中心工作作了总结，他特别强调了中心研究人员应该把握好重大项目的研究进度，力争在明年中心大检前多一些项目结题并出版，为中心增加一些标志性成果。方一新主任还提到了中心明年准备举办一次以“汉语历史词汇与语义演变”为主题的国际学术会议。

张涌泉副主任就中心拟将出版的《汉语史丛书》的入选资格、程序、体例以及资助方式等问题作了说明。同时，还通报了中国古典文献学申报全国重点学科的工作情况。

王云路副主任主要就中心学术刊物《汉语史学报》的工作作了讲话，并提到已有多篇学报论文为人大复印资料转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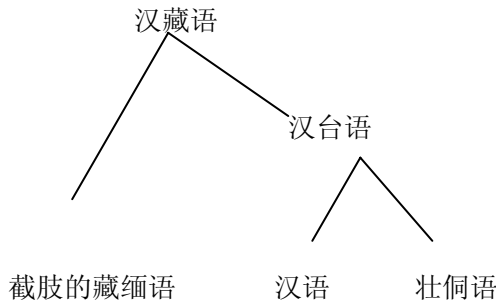
学术交流

荷兰莱顿大学 George van Driem 教授来我中心作学术报告

2007 年 7 月 24 日晚, 荷兰莱顿大学 George van Driem 教授在我中心作了题为《The Tibeto-Burman language family and the ancestry of Chinese (藏缅语系和汉语的系属)》的学术报告。

van Driem 教授首先指出, 喜马拉雅地区有非常丰富的语言资源, 仅尼泊尔境内就有 80 多种语言。基于对喜马拉雅广大地区多种语言进行的广泛调查, van Driem 教授指出, 从系属关系来看, 这些语言和汉语之间的亲属关系要近于汉语和中国境内的很多种语言之间的关系, 比如蒙古语、维吾尔语等, 因此这些语言和汉语应该归于同一个语系。目前关于汉语的谱系分类主要有两种互相竞争的观点: 一种认为汉语属于汉藏语系, 另一种则认为汉语应归属于藏缅语系。van Driem 教授提出, 应该用“藏缅语系”来代替“汉藏语系”的提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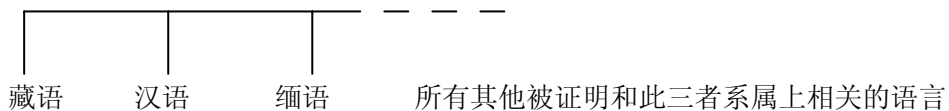
van Driem 教授认为, “汉藏语系”这个词实际上是带有殖民和种族歧视色彩的“印度支那语系”的替代品, 除了带有政治方面的歧视, 从谱系分类上来看“汉藏语系”的说法也是不科学的, 它基于这样一株谱系树:



(van Driem 教授所说的藏缅语系包括汉语，所以不包括汉语在内的藏缅语他称为“截肢的藏缅语”。)

van Driem 教授认为，藏缅语是一个语族 (language group)，而不是和汉语具有同等地位的一个语支 (branch)。印欧语系 (Indo-European) 的提法揭示了语言间的源流关系，但是上述谱系树却没有显示出这种传承，所以这种分类方法是不科学的。他认为，如下的谱系分类方法更加科学地反映了语言实质：

藏缅语系



每一种语言都包括若干种方言。

van Driem 教授还指出，语言的系属分类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并非单纯依靠生物学意义上传承，一块土地上的现有语言并不一定和这块土地上的古代语言具有传承关系。

van Driem 教授最后还饶有兴致地谈到他目前正在进行的研究项目：人类的基因对语言系属划分的作用，他坦承，人类基因和语言系属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但他透露他的项目已经得出了一些卓有成效的结论，这个谜底他将于明年 8 月在云南举行的学术讨论会上揭晓。

演讲结束后，van Driem 教授还回答了听讲师生提出的“形态在语言的谱系分类中的作用”、“以基因数据来支持语言的谱系分类的科学性”等问题。

学术报告会由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云路教授主持，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主任方一新教授出席了报告会。博士研究生张峰辉为报告作了翻译。王云路教授认为，van Driem 教授的学术报告富于启发性，是一场

非常精彩的学术报告。

丁邦新教授来我中心讲学

应我中心之邀，著名语言学家丁邦新教授以浙江大学“永谦讲座学者”的身份，于9月7日来我中心作为期三个月的讲学和驻所研究。

丁邦新教授的“方言与音韵专题研讨”课自9月12日正式开始，上课时间为每周三第二至四节课，授课对象为本中心研究生。

附：“方言与音韵专题讨论”教学大纲

此一课程为中国方言与音韵之专题讨论，预计以汉语方言现况与音韵演变为讨论之中心，对若干问题作深入之探讨。说明方言问题有时要以音韵学的知识解决，而音韵问题有时要借重方言的资料才能找到答案，因此方言与音韵的研究是密切相关而无法分开的。每周两堂课为一个单元，每一单元讨论一个问题或一组相关的问题，首先由授课者对背景作较详细之讲解，继之以综合讨论。

- | | | |
|-----|--------|----------------|
| 第一周 | 9月12日 | 从国语说起：音系中的几个问题 |
| 第二周 | 9月18日 | 汉语方言的层次 |
| 第三周 | 9月25日 | 方言接触的类型 |
| 第四周 | 10月2日 | 假期 |
| 第五周 | 10月9日 | 吴闽关系 |
| 第六周 | 10月16日 | 切韵的性质及中古音的拟测 |
| 第七周 | 10月23日 | 切韵四等韵介音有无的问题 |
| 第八周 | 10月30日 | 中古音系中匣母的上古来源 |
| 第九周 | 11月6日 | 汉语和台语的关系 |
| 第十周 | 11月13日 | 缴交期末报告 |

第五届丁邦新语言学奖颁奖仪式 暨丁邦新学术演讲会在邵科馆举行

九月二十六日上午九点三十分，“第五届丁邦新语言学奖颁奖仪式暨丁邦新先生学术演讲会”在西溪校区邵科馆一楼会议厅正式举行。颁奖仪式由中心副主任王云路教授主持，人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廖可斌教授到会祝贺。中心主任方一新教授、副主任张涌泉教授以及中心其他研究人员也出席了颁奖仪式。丁邦新先生亲自为本届获奖同学韩小荆、杜朝晖、赵庸、陈源源颁奖，并作题为《谈散文的抑扬顿挫》的学术报告。

颜洽茂教授被评为 全国语言文字工作先进工作者

今年是第十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为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大力营造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的良好社会氛围，努力开创语言文字工作的新局面，同时表彰广大语言文字工作者对语言文字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国家语委日前发文，决定表彰全国语言文字工作先进工作者，我校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本中心颜洽茂教授榜上有名。

1997年以来，全国语言文字工作战线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扎实工作，团结奋斗，锐意改革，积极进取，为实现全国范围内普通话初步普及、汉字的社会应用基本规范，推进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构建和谐的社会语言生活做了大量工作，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群体和模范人物。

丁邦新教授在我校“东方论坛” 作学术讲座

10月18日下午三点半,浙江大学“东方论坛”第十一期学术讲座开讲。香港科技大学、美国加州大学教授,浙江大学永谦讲座教授丁邦新先生作了题为《诗律和创作——半个古典诗人的独白》的学术讲座。

讲座由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主任方一新教授主持。浙江大学人文社科处楼含松副处长到会听取演讲。

讲座大纲如下:

- 一、平仄的意义
- 二、明律与暗律
- 三、古典诗创作中暗律的应用
- 四、古典诗创作的过程
- 五、我写杭州的诗

丁邦新先生来我中心作学术讲座

2007年11月8日上午9时30分,浙江大学“永谦讲座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丁邦新先生来我中心学术报告厅,作题为《词汇与文学作品的考证》的学术讲座。中心主任方一新教授、副主任王云路教授,中心成员黄笑山教授、陈忠敏教授、姚永铭副教授出席了本次讲座,参加此次讲座的还有中心的硕博研究生。

中国人民大学胡明扬教授来我中心作 学术座谈

11月8日晚，中国人民大学胡明扬教授来我中心，围绕着“语言学的治学方法”的主题，与我中心研究生进行了座谈。

北京大学中文系陆俭明教授来我中心 与研究生座谈

2007年11月11日晚7:00—9:00，著名语言学家、北京大学中文系陆俭明教授来我中心与研究生进行座谈。

陆俭明教授首先向同学们谈到如何进行研究，如何培养研究能力的问题。陆教授指出，进行科学研究就是要培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读书过程中，要注意把书本知识转化为自己的知识，寻找作者文章中的积极因素。同时前贤由于受当时研究水平和自己研究目的的影响，难免会有疏漏，发现疏漏的过程就是一种分析问题的过程。进行语言研究，要会从语言生活中发现问题。陆先生以“我+Adj+吗”句式为例，指出此句式中Adj的选择存在一定限制，可以出现“容易、好过、开心、幸福”，但不能出现相反意义的“困难、难过、痛苦”，此句式理解为反问句还是疑问句也会影响Adj的选择。

陆先生提到理论问题在语言研究中的重要性，他指出，理论建设是学科发展的关键，在对待外来理论上，既要了解国外理论产生的背景，又要考虑是否能够解释汉语现象。陆俭明先生还就直接成分分析法、变换分析法、语义指向分析法在汉语研究中的作用进行了实例分析，具体说明理论在汉语研究中的重要作用。陆先生以自己实际研究为例说明语言理论的价值，他对量词“位”用于自称的现象进行了分析，在Grice“合作原则”和Leech“礼貌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应答协调一致性原则”。

最后，陆先生和同学们进行了热烈交流和讨论，对同学提出的如何选题、如何阅读等问题进行了耐心解答。陆先生精彩的表述引来同学们的阵阵掌声。

本次座谈会由浙江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主任方一新教授主持，汉语史研究中心、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及外国语学院的部分师生参加了座谈。

研究生动态

第五届（2006 年度）丁邦新语言学奖 评选揭晓

经本人申请、校内外专家初评、中心评奖委员会最终评定，第五届（2006 年度）丁邦新语言学奖获奖名单揭晓：

韩小荆（2003 级）博士学位论文《〈可洪音义〉研究——以文字为中心》，获博士生一等奖。

杜朝晖（2003 级）博士学位论文《敦煌文献名物研究》，获博士生二等奖。

赵庸（2004 级）硕士学位论文《杭州话的文白异读》，获硕士生一等奖。

陈源源（2004 级）硕士学位论文《妙法莲华经释文研究》，获硕士生二等奖。



编辑部地址： 中国 浙江 杭州 浙江大学西溪校区东一教学楼五楼、六楼

邮政编码： 310028

电话(传真)： 86-571-88273589

Email: hyshi@ema.zju.edu.cn

印发日期： 2007 年 12 月 30 日

印发份数： 250 份